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王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05)

[摘要]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关键词] 运河;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名称溯源;国际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4)01-0060-19

一、厘清大运河名称源流脉络意义重大

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以运输为目的、沟通自然河流的人工水道,就是现在通称的运河。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先秦以来,中原、江汉、江淮、太湖、蜀中都有内部沟通人工河道。^①而众多运河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公元前486年邗沟的开凿,《左传》鲁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②今天,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为大运河的开端已经成为共识。古代人工水道的叫法很多,名称没有统一。诸如“沟”“渠”“渚”“漕”“运渠”“漕河”“漕渠”“官河”“市河”“运粮河”等,都是各时期运河的名称。各段运河在不同时期也有各自的名称,如江淮间的邗沟、淮扬运河,关中的漕渠、广通渠,黄淮间的通济渠、汴河、中运河,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御河、卫河、南运河、北运河、通惠河,山东的济

[收稿日期] 2023-11-20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运河精神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18WTD004);江苏文脉研究工程专门史项目“江苏运河史”。

[作者简介] 王健(1959—),男,安徽泾县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大运河历史文化。

① 大禹治水之后,“自是之后,蒙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司马迁撰:《史记》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07页。

② 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按:该书标点“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注:“于邗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新1版,第1762页。

州河、会通河,长江以南的江南河、徒阳运河、苏州塘,等等,支线运河的名称就更不计其数。明代因漕运体系而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等河段名称,清代沿袭。^①清代至民国亦称京杭运河。要之,春秋战国以来文献对人工河道的称谓名目繁多,虽然丰富多彩,但也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古代文献中“运河”名称的出现,是宋元明清对具有沟通地方与都城或区域之间的人工水道最普通的称呼,其意义在于逐渐将复杂多元的名称统一起来。其标志应是国家正史《明史·河渠志》中“运河”专篇的设立,突出了北京与杭州之间以漕运为目的的运河的重要性。从此,虽然各种名称仍然存在,但最通行最正式的名称就是“运河”,所指也逐渐专指京杭间的运河。

然而,元明清以来,随着西方人(包括后来的日本)陆续到来,对中国运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往往从中外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的运河,在沿用运河等中国传统习惯名称的同时,还将元代形成的从北京到杭州间的运河称为“伟大的河”“皇家运河”“帝国运河”乃至“大运河”。以区别于普通的运河名称,显示出对以漕运为目的修建的京杭间这一伟大航运工程卓尔不群品质的肯定与敬佩。由此,大运河(或译为京杭大运河)成了京杭间运河的专用称呼。晚清民国以来,大运河之名渐为国人接受,在继续使用运河、京杭运河等传统名称的同时,也开始使用“大运河”之名。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运河之名更加流行,以至于成为最通行的正式专用名称,仍然主要是指京杭大运河。

21世纪以来,大运河内涵发生变化。2006年,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第6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列入2014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长达8年的申报过程中,人们对大运河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国大运河曾经有过两次全国性的大沟通,第一次是隋代以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包括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的体系,这就是隋唐大运河。而到了元代,由于都城迁到北京(时称大都),大运河改弦为弓,出现了第二次大沟通,形成了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所以,历史上的大运河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还应该包括隋唐大运河。这样,大运河就是隋唐大运河(包括宋)+京杭大运河(相当部分河段是重叠的)。之后,又进一步认识到,早在隋唐宋时期,大运河就从杭州越钱塘江进入浙东运河到达宁波,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沟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1]到了宋元以后,浙东运河仍然起作沟通内陆与海洋的作用。于是,又将浙东运河纳入大运河申遗河段。这样,“大运河”就是最早开凿于邗沟,形成于隋唐,完成于元,繁荣于明清,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条运河构成,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永济河、通济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十个河段,包括部分复线在内总长度约3166公里的完整的运河体系。由此,“京杭大运河”申遗改为“中国大运河”(简称“大运河”)申遗,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大运河列入。2013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正式称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具体列入的“遗产运河”由三条运河、十个河段的1100公里组成,31个组成部分,85项遗产要素,并非整个中国大运河的3166公里,364项遗产要素的全部。^②可以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只是中国大运河中以古运河

① 参见《明史》《清史稿》的《河渠志》“运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977年版。

② 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2013年3月。

为主体的大运河河段,而作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大运河则是大运河的全部,这是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空间范围。

由上可知,运河之名经历了多元名称到一元运河的转变,又由普通的运河名称向特殊的大运河名称变化,随着大运河申遗,其内涵更加丰富,最终成为一个体系的过程。大运河内涵和空间范围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基础,厘清大运河名称演变脉络及其内涵就显然极为重要。大运河从沟渠渚等名称到运河名称的源流嬗变,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考证讨论,其脉络是比较清晰的。^①现在国内外流行的“大运河”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即从“运河”到“大运河”的名称是怎样演变的,学术界语焉不详。近年来有人提出大运河名称最早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②这本是没有根据不值得驳斥的标新立异之说,然而,这种说法一方面一经媒体传播,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很容易变成“常识”;另一方面近来却也得到权威研究机构专业研究者的采信,认为:历史上大运河主要被称作漕渠,即使在“运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时期,也并未出现“大运河”的称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阴卷烟厂创造了“大运河牌”香烟,江苏省又成立了“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这条水道才第一次拥有了“大运河”的称号。“因此,将大运河作为一种颇为现代的文化记忆产物,有助于我们跳出狭隘的对于所谓历史真实性的执拗,不去过度强调保持或是‘回到’所谓的某个历史时期,从而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理背景和社会条件,开展因地制宜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和民生需求的大运河保护利用措施。”大运河名称源于香烟的假说,似乎已经定讞,而且能够作为大运河生活化接地气,向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的依据。^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大运河名称嬗变的关注和思考,神圣的“大运河”名称难道真是源于一种香烟产品牌子,与长城齐名的大运河,即西方人早就津津乐道、赞叹不已的伟大的河,会晚到1958年才出现大运河的称谓,令人匪夷所思。

先哲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大运河是与长城齐名的代表中华文化形象的世界文化遗产,弄清其名称源流本身就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考证从运河到大运河名称演变,充分认识并阐释其内涵价值,对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有重要价值,对进一步彰显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我们不揣简陋,尝试从运河到大运河的名称演变作溯源考辨,由此进一步论述大运河名称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重大意义。

二、从沟渠渚到“运河”的名称演变

先秦到秦汉,人工河流多称为沟渠渚之类,汉代开始有“漕渠”之称,一般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与渭河平行的漕运河道,即“关中漕渠”,这表明运河的功能主要是漕运,或专门为漕运开渠。隋唐以后,名称更多,如沟、渠、河、市河、官河、漕河、运粮河等。北宋以后经常称“运河”,与漕河相比,或说明运河的功能除了漕运,还包含其他运输。元以后可称运河或京杭运河,特指北京到杭州的运河,如康熙、光绪年间的京杭运河图。^[3]

有学者对古代“运河”名称含义提出疑义,认为古代开凿的河,多是东西走向的,叫渠,隋炀帝开

① 兹举关于运河名称讨论的成果: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郑慧生:《“运河”正名》,《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李德楠:《京杭运河江北段工程与地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顾丽娟:《京杭大运河名称考》,《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谢光前、童佳颖:《流动的运河与江西》,《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 燕海鸣,刘曙光:《讲好“大运河”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4日,第A06版。全国政协文化和文史学习委员会主编、中国遗产研究院承编:《大运河画传》,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

凿的是渠不是河。隋炀帝修运河是后人的说法,只有开凿南北走向的河才称做运河。^[4]还认为“运河”之名首见于元代,明朝就专指南北漕运之河了。又说把苏伊士运河翻译成运河是不明白运河的含义,应翻译为渠。其实,隋开凿的通济渠虽然呈东西,但也是南北跨度的。邗沟典型的南北走向,并没有叫河,而是称沟、渚。同样,东西走向的通济渠在唐宋又多称为汴河、亦或汴渠,最早在开封到徐州也有东西走向的汴河。可见河渠并不一定有表示河道方向的含义,更不能以此不明确的定义去命名近代国外的苏伊士运河,因为此时的运河已经是人工河道的通行名称。中国自然河流多是东西走向,姚汉源称隋唐大运河为“东西大运河”,以区别于元代以后的京杭大运河。^[5]但从总体方向上看,大运河主要是沟通南北的,从长江流域到淮河流域再到黄河流域、海河流域。

北宋文献已经频繁出现“运河”,如北宋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有“宝应有运河”。《宋会要辑稿》中也有许多“运河”记载,^①运河之名并非元代首见。学者根据《四库全书》检索“运河”一词,统计已经有94种宋代文献使用了“运河”,宋代经常使用“运河”之名是毫无疑问的。^[6]“以‘运河’特指人工水道,至迟始于宋代。”

从中国古史文献看,中国古代运河的称呼多元纷杂,南北方也不尽相同,如水、渚、沟、渠、洫、塘、水道、汴河、漕渠、漕河、运渠、官河、市河、运粮河等,不一而足。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在位)开凿的春秋最早的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渚”,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了江汉。楚昭王时伍子胥率吴军攻入楚国,疏浚运道,故称“子胥渚”。在不同的河段,其名称也各有其名,诸如汴渠、通济渠、会通河、邗沟、御河等。在江苏,各段运河的名称则有邗沟、山阳渚、江南河、江南运河、河漕、湖漕、江漕、苏北运河、苏南运河、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多种称谓。按时代考察,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渚、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例如,北宋王存(1023—1101)编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中有运河记载。^②但北宋初更多的是各条运河的具体名称,如汴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御河等。到了南宋,运河名称更加普及,如南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三,“运河自吴江东南长生来,是谓贪狼之水,本由蛇门入。”“况蛇门直南,正对吴江运河。”^[7]“孙老桥,在运河上,唐白头桥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圣初,郡守孙冕重修,故易今名。”^[8]这条运河唐朝就存在,白居易在运河上建桥。正史中,元人编纂的《宋史·河渠志》中使用运河名称,但汴河等不直接称运河,多指淮扬及以南的运河,包括新开的河道,如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开凿的“龟山运河”。七年十月,“浚真、楚运河”。^{[9]2381}在古代帝王中,宋徽宗对运河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他连续下诏对运河进行治理。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开淘吴松江,“其余浦闸、沟港、运河之类,以次增修。”^{[9]2385}政和二年(1112),“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9]2386}宣和四年(1122),诏曰:“江、淮漕运尚矣。春秋时,吴穿邗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汉吴王濞开邗沟,通运海陵。隋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雍熙中,转运使刘蟠以山阳湾迅急,始开沙河以避险阻。天禧中,发运使贾宗始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三堰以均水势。今运河岁浅涩,当询访故道,及今河形势与陂塘渚水之地,讲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济不通。可令发运使陈亨伯、内侍谭稹条具措置以闻。”^{[9]2388—2389}

① 《宋会要辑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北宋中期(1080年左右)《元丰九域志》中淮南路扬州、楚州、泰州属县有“运河”记载,六合亦有运河。王存撰:《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研究者指出:“以‘运河’特指人工水道,至迟始于宋代。这一时期除汴渠外,淮河以南的人工水道多称‘运河’。如淮扬运河,因南端属真州,北端属楚州,称‘真楚运河’或‘淮南运河’。又以‘高邮运河’‘扬州运河’‘临安运河’等为相应区段的运河命名。”^①元人编纂的《宋史·河渠志》中已经普遍使用运河一词,夹用运渠,“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扬等州运河浅涩,委陈亨伯措置。三年春,诏发运副使赵亿以车畎水运河,限三月中三十纲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纲运会集要口,以运河浅涩,故不能速发。’”^{[9]2388}运河与漕运紧密相连,特别是“东南诸水”,即江淮一带漕河习称运河。

明人编纂的《元史·河渠志》中有“扬州运河”,“运河在扬州之北。”^{[10]1632}“练湖”条记述镇江“运河”,“镇江运河全藉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往来,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时专设人夫,以时修浚。练湖蓄潦水,若运河浅阻,开放湖水一寸,则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浅,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运递,甚为不便。委官相视,疏治运河,自镇江路至吕城坝,长百三十一里,……”镇江路总管等议:“练湖、运河此非一事……”是两个工程,“宜趁农隙,先开运河,工毕就浚练湖。”^{[10]1633-1634}镇江运河并非全为漕运,商贾及农民往来都要靠此河舟楫交通。“开浚运河、练湖,重役也”。“已分运河作三坝。”三坝所涉河段,包括平江(今苏州)境内的昆山、嘉定、常熟、吴江诸州,及长洲、吴县等县,“开运河夫万五百十三人”。“龙山河”条记,开凿钱塘江至杭州运河间的河道。“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武宗到大元年,江浙省令史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来,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递运官物,甚为烦忧。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里,粪壤堵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迹其形势,宜改修运河,开掘沙土,对闸搬载,直抵浙江,转入两处市河,免担负之劳,生民获惠。’省下杭州路相视,钱塘县城南隅龙山河至横河桥,委系旧河,居民侵占,起建房屋,若疏辟以接运河,公私大便。”^{[10]1642}在龙山河旧河旧道上改修运河,连接已有的运河(市河)。由上可知,元代扬州至杭州段,大运河均可直称“运河”,这与《宋史·河渠志》的记载比较一致。

1994年在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支持下,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专家会议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遗产运河信息文件》,其中对运河(canal)的定义是“一条人工建造的水道”。1996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又主持拟定了《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入选条件,我国的京杭大运河、灵渠都被列入,并且给予高度评价。^②显然,“运河”名称是对各国人工水道的通称或泛称。我国的权威工具书也是这样定义的。

《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运河》对运河的诠释:“运河,中国古代的人工水道”。“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元代修凿完成北起大都、南达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的大运河。”^③

《辞海》“大运河”条目:即京杭运河,简称运河。我国古代伟大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京、津、冀、鲁、苏、浙4省2市,沟通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始凿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

① 谭徐明,王英华,李云鹏,邓俊:《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第11页。《宋史·河渠志》,《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87、191页。

② 刘曙光撰:《总编:“一个玉汝于成的传奇——中国大运河申遗述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编:《中国运河志·附编》。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471—1478页。

期),后经七世纪(隋)和十三世纪(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接而成。”^①

运河在唐以前称为沟、渠、漕渠、运渠,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大运河则是特指,即元代修建的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辞海》说大运河是运河的简称,直指为京杭运河,只谈到从沟渠浚到运河,大运河指京杭大运河或京杭运河,但都没有关注从运河到大运河的名称演变,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差异。综上可知,古代,大运河名称很多,各时代不一样的。但宋元以后比较常用的名称就是“运河”,到了明清时代运河更成为普遍称呼。元以后的运河,指的就是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运河名称逐渐完成从多元到一元的演变。

三、“大运河”之名起源纠葛

那么最早的大运河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学者指出南宋文献出现了“大运河”名称。^[6]南宋《淳祐临安志》卷十,“城外诸河”: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由清湖堰闸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吴欣教授指出这里的“大运河”就是江南运河。^②从这个意义上看,大运河最早的名称出现在南宋。

《淳祐临安志》为淳祐十二年(1252)施谔撰。相同的记载也见于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城内外河”：“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接城中小河、清湖河，两河合于北郭税务前。由清湖堰闸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嘉兴路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下塘河。**新开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北，通苏湖常秀润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杭都。”^③吴自牧的书成于临安1275年被元军攻占之后不久，晚于《淳祐临安志》，应该是利用该志的资料，因为在《梦粱录》中吴自牧提到临安新旧志，卷十七：“以《大藏经》《高僧传》《钱塘胜迹记》临安新旧志皆备其详矣，兹不复赘。”卷十八“人口”中直接引用《淳祐志》《咸淳志》，应该属于一同一条史料的不同记载。这是目前唯一的古代称运河为“大运河”的史料。非常珍贵。当时江南运河嘉兴到余杭的线路有两条，一是经过长安闸的线路，这是隋以后形成的古运河线路。被称为“大运河”，一条是新开的线路，被称为“新开运河”。显然，这是为了区别两条线路，称古旧的一段为大运河，可能是这条运河形成早，是隋代运河正道。现在虽然改道，名其大运河，是否含有对隋代大浚江南河的尊重，或是在此之前就已经称为“大运河”，由于没有发现同时期，或之前之后的文献有大运河的称谓，只能存疑。应当指出的是，此处名大运河，与后来西方旅行家命名的大运河含义有本质区别。在南宋乃至之后的元明清，也未见文献中有“大运河”的称呼出现，昙花一现的“大运河”之名就这样消失了，这条弥足珍贵的材料说明南宋临安附近的江南运河已经有过“大运河”之名，以此区分新旧不同的运河河段，但无法作为整体的大运河名称的起源。

① 《辞海》，“大运河”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缩印本（1980年）第629页。

② 施谔纂修：《淳祐临安志》卷十，城外诸河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接城中小河清湖河），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前。由清湖堰闸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相合分为两派—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的水利建设》，《中国鉴湖》第三辑，引用该文说明。

③ 阙海娟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十二，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207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最早的大运河名称起源于1958年,此后流行,越叫越响。互联网上这种说法已经很有影响。范成泰先生2008年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京杭大运河”或“大运河”之名源于淮阴卷烟厂1958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京杭大运河的名称兴起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1958年初,地方国营淮阴卷烟厂(原国营华新烟厂),在市场上试销“大运河牌”香烟,其外包装“大运河”三字的上方的图案是北京天安门,下方的图案是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京杭”的含义已寓于图标之中,意即“京杭大运河”。1959年7月,正式全面上市。大运河香烟的上市,非常畅销,深受普通烟民们的欢迎,一时声名大振,市场热销。当年的淮阴,同时面市的商品,还有大运河牌油漆、大运河牌肥皂等,以大运河为品牌的商品,几为家家户户必备的用品,一时,“大运河”的品牌遍及大江南北,“京杭大运河”已深深地印在广大群众的心中。^[2]

虽然学术界对从运河到大运河名称演变研究不多,语焉不详,但源于香烟牌子的说法并不是建立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之上,也非在正式的学术报刊上发表,一般的运河专业研究者是不会采信,也没有专门的考证或反驳。然而,最近有专业研究者显然采信或提出了相同说法,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历史上,大运河主要被称作漕渠,即使在‘运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时期,也并未出现‘大运河’的称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阴卷烟厂创造了‘大运河牌’香烟,江苏省又成立了‘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这条水道才第一次拥有了‘大运河’的称号。”^①作者的意思很明确,第一,古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直到1958年中国未出现过“大运河”的称呼。第二,“大运河”第一次用来称呼运河是在1958年大运河牌香烟出现之后,以及随后江苏省成立大运河工程指挥部,这才有了大运河名称的使用。

大运河之名源于大运河牌香烟的说法,如果仅是网上流传的资料,作为专业研究者可以置之不理,但作为国家课题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报刊上就需要慎重对待了。当今各种观点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迅速,受众庞大,许多“新说”发布之后,普通受众易于接受,信者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可能成为一种混淆视听的“常识”。因此,亟须辨析真伪,考镜源流。这里,先对此说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大运河”牌香烟是淮阴卷烟厂于1959年5月投产的乙级烤烟型卷烟,并非为1958年生产。^[11]其牌子流行应在1958年3月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成立之后,而不是之前。当年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与江苏省水利厅合署办公,“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筹划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航道的拓宽疏浚和沿线大型建筑物的测量、设计和施工。专区亦建立指挥部。”^②可知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名称已经出现,并且是一条运河的两种名称。这个名称,肯定在成立指挥部之前就已经正式存在。

第二,按作者的说法,1958年大运河牌香烟和江苏成立大运河工程指挥部才使运河水道第一次拥有了“大运河”的称号。其实,1958年初是国家先成立了“大运河建设委员会”(交通部成立“京杭运河建设委员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4省人民政府分别成立大运河工程指挥部),之后的三四月间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成立,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筹划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航道的拓宽疏浚和沿线大型建筑物的测量、设计和施工。^③先有国家大运河机构成立在前,江苏省级机构成立

① 燕海鸣,刘曙光:《讲好“大运河”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4日,第A06版。该文为《大运河画传》前言部分。

② 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江苏航运大事记》,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按:一说4月。

③ 《江苏航运史》(现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520页;徐从法:《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06—107页。

在后。1962年10月,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奉命撤销。^①

第三,作者文中明清时期的“明清”时间模糊。明清时期一般指1368年明朝建立开始,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为止。1912年到1949年,则为中华民国(1912.1—1949.9),1949年10月到1958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9年,合计46年时间。考察大运河名称,这段重要时间不应忽略甚至遗漏。

第四,作者断言的运河这条水道是1958年之后才第一次拥有“大运河”称号,这个第一次,是指中国人第一次称“运河”为“大运河”,还是指国内外第一次称运河为大运河?从行文看,显然应该是指后者,因为,如果在1958年之前,国际上已经有了大运河称呼,国内仅仅是采纳这一名称,就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了。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早就流行的国际运河名称,由于我们过去不知道或没有采用的话,就算不上大运河名称第一次出现,学术价值也大打折扣。就像我们今天广泛采用的“丝绸之路”之名,现知最早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国》一书中提出命名的,很多年后传到国内,逐渐为中国学者采用,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学术话语。现在学术界在讨论“丝绸之路”名称起源时,无疑应以李希霍芬命名时间为准,如果要讨论,就只能追溯比李氏更早的命名,^②而不会将中国人最早采用这个名称的时间作为“丝绸之路”名称的源头。

大运河之名起源,最早到南宋,最晚1958年,两者竟然相差达700余年,仅就此就可见厘清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

四、从运河到大运河名称演变考察

学术界有句话“说有容易说无难”。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占有资料,避免武断下结论,任何过头话、绝对化的结论都是很危险的。“香烟牌子”说面向大众普及大运河名称,提高知名度的作用的确不小。但1958年之前中外大量使用大运河名称使之无法自圆其说。下面,我们重点考察“运河”之名是如何向“大运河”名称演进的,大运河名称的使用,是对中国运河内涵认识的升华。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使用大运河之名的应是西方来华的使者或旅行家,之后经常使用并对其含义进行阐发的也多见外国文献。元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越来越多来到中国,他们亲见长城与运河,感受其体量巨大,建筑之伟大,历史之悠久,故给予很高评价,称其为伟大的墙(Grand Wall,或Great Wall),伟大的人工水道、航道(the Great Canal, Grand Canal)。这样的命名是通过对外中伟大建筑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认识,在古代中国文献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比较认识。因为在古代,中国人没有可能对外中运河进行比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山中”,也就无所谓“大运河”“伟大的城墙”之类的认知。

向达最早介绍过“有元一代中西大通,欧洲人及阿拉伯人来游中国者甚多。”他列举了罗柏鲁(Rubruquis),柏良朗嘉宾(Plano Carpini),森拔(Sempad hayton),海屯(Hayton),以及其他天主教士。“而有纪述者又无虑数十。”他选取了马哥孛罗(Marco Polo),奥代理谷(Odoric of Pordenone),约翰(John de Cora),马黎诺里(John de Marignolli),伊宾拔都他(Ibn Batuta),亚布尔非达(Abulfedā)六家所作述游之书,择其与杭州有关者,翻译论述,涉及到大运河。^③之后的相关论著更

① 《江苏航运史》(现代部分),第189页。

② 按:最新的研究认为在李希霍芬之前国外就有人已经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李伯重。

③ 向达:《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号,民国十八年五月,1929年。

多,但很少涉及大运河名称研究。^①

陈桥驿先生对大运河名称演变有过讨论。他指出:外国人称我们的南北运河为“大运河”,南北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是元代以后形成的运河。“‘canal’是个晚中古英语,……而‘运河’一词,以权威文献而论,《新唐书·河渠志》中在北宋时代已经见及,^②按时代实早于西方的‘canal’。但现在我们使用这个词汇已经很普遍,无疑是‘canal’的合适对译。”就是 canal=运河。而大运河,则应是西方人对京杭间运河不同于普通运河的特别称呼。陈先生特别指出,“因为从古代的伟大建筑来说,中国人可以称雄世界的,自东而西的有‘万里长城’,自北而南的有‘大运河’,即英语中的 Great Wall 和 Grand Canal。对这两个词汇,我们自己的翻译和某些外国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游记之类的文章里,也都照译不误。”他指出《韦氏新世界字典》“对于‘万里长城’其词条就作 Great Wall of China,但是对于‘大运河’,词条虽然也作 Grand Canal,但其释义却有两条,其一是中国的南北运河,其二是意大利的威尼斯运河。所以对于长城和运河,中国人自己当然是自豪的,但是在国际上,对两者还存在不同的评价。所以特地在此一提,对一些不大注意国际行情的人打个招呼。”^[12]

陈先生注释用的是 1972 年版的韦氏新世界字典。其实,早在 1911 年第 11 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条目下,就有长江(扬子江)和大运河。使用词汇是 Grand Canal。作者:Herbert Allen Giles。Herbert Allen Giles 为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和汉学家,赫伯特·艾伦·贾尔斯(1845—1935),汉名翟理斯(又译翟理思)。1897 年继威妥玛后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著有《中国概要》(1876)、《华英字典》(1892)、《中国的文明》(1911)等许多著作。翟理斯是早期英国汉学权威,改进威妥玛拼音方案,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威妥玛—翟理斯汉语罗马拼音法。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768 年出版第一卷,以后不断扩充,再版,奠定了后来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一世界最权威工具书的基础)一百多年前收录“大运河”条目,充分说明国际汉学界早在之前就广泛接受了大运河这个概念。这无疑证明,早在近代“大运河”名称已经得到世界权威工具书的认可。至于陈先生说的长城与大运河的国际评价差异是否表现在措词上的“国际行情”也未必存在,因为在 19 世纪外国媒体在英文书写中,也有 the Great Canal 的写法,并非都写成 Grand Canal。^{[13]346}

长城是独一无二的,^③许多国家有运河,但大运河(the Grand Canal)其实也是举世无双,除了威尼斯的所谓“大运河”之外,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 1949 年出版的名著中称意大利波河附近一条 50 公里长的运河为“大运河”。意大利“大运河”:意大利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南部有亚平宁平原,“在这两座壁垒之间,下伦巴第地区是一个由丘陵、高原、平原和河谷组成的综合体。”平原地区,运河改造了地貌,“这块平原完全是靠人力改造而成的。人铲平了原来的山丘,填平了沼泽,巧妙地利用了来自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江河流入。治水行动至少于 1138 年前后已由本笃会修士和西多会修士在‘基亚拉瓦莱’开始进行。大运河于 1179 年开始动工,并于 1257 年由执政官贝箕戈佐迪尼完成。这样,泰辛河通过一条长 50 公里左右的、兼顾灌溉和航运的

① 外国人对大运河的观察,系统介绍的有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心中的大运河》,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年版。本书主要介绍浙江,特别是杭州运河。“京杭运河在西方被称为‘帝国运河’。曾几何时,这项不借助任何机械而完全由人力完成的工程在国外享有盛誉。”(第 10 页)没有涉及大运河名称起源问题。陈学文:《外国人审视中的运河、西湖与明清杭州城市的发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朱亚非:《古代京杭运河与中外文化交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王健:《积淀与记忆:古代西方旅行家书写大运河》,《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胡梦飞:《明初高丽使节眼中的江苏运河——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主要是对外国人游历运河的史实论述。

② 按:这里可能是笔误,《新唐书》没有《河渠志》,应该是《地理志》。有运河专篇的正史是《明史·河渠志》。

③ 古罗马有千里长城,但远不能与中国长城媲美。

人工河到达米兰。”“早在1300年前,人们已从塞西亚河引水到巴斯卡灌溉渠,后来又对塞西亚河实行分流,开辟比拉加、博尔加拉等其他灌渠,用以灌溉瓦雷塞和洛梅利纳地区。”^{[14]73}由此看,意大利50公里长的大运河的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国际上“大运河”名称已经出现,之后西方人到中国,从众多运河中将中国京杭间运河挑出来独称大运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马可·波罗对运河的记述

马可·波罗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包括大运河)的西方人,他的游记一度被认为是“百万先生”而不被人相信。然而,今属摩尔多瓦的旅行家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1636—1708)于清康熙十六年(1676)来到中国,两年后撰写了游记,高度评价马可·波罗,“首次撰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在他之前,在欧洲无人知晓世上还有个中华帝国,甚至许多人还断言,马可·波罗只是信口雌黄。”^{[15]6}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山东临清,“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他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便利。”^{[16]160}按:临清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又宽又深的河流”,元代就是卫河与山东运河的交汇处,从中原来的货物在此与从南方来的货物都汇聚到这里,由运河北上。税收是临清的一个重要财源,有临清关。在大运河没有整体通航的元代,区域性的运河运输仍然很发达。杭州“天堂”之城,南宋都城,世界之冠,“街道宽广,运河宽阔。”还有大大小小的运河,交通四通八达,“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主要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有一条很大的运河”,岸边建有仓库储存货物,供给印度等东方商人。^{[16]175-176}

梁生智译本将“主要运河”(the principal canals)翻译成“大运河”,“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17]冯承钧译为“大渠”,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名称,也间接说明,民国时期大运河之名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①

马可·波罗使用了“运河”名称,但是否用大运河称为仍然存疑。即便没有直接使用大运河名称,但频繁采用运河名称,而且指出其中一条最为重要的主干运河、大渠,基本上接近称呼大运河了。他对元代那条大都与杭州间的运河的评价已经点出了大运河的基本特征。宏伟的工程、奉大汗之命开凿、为大都漕粮运输,沟通南北,深水大河、又宽又深,很大的运河、主要运河、成千上万的帆船,沿岸许多城市,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重要节点,这些不同于一般运河的大运河特色标签,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长度和贯通方面,尤其指出对沿岸城市兴盛造福人民的意义,体现了西方人对大运河内涵的细致观察和凝练概括,起点之高,无疑对后来的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皇家运河、帝国运河等名称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团获得批准,从广州前往北京。3月17日,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广州出发北上,排场很大,5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由广东海道指挥,护送荷使。7月17日到达北京城。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是这个出使中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使团的管事,实际上就

^① 冯承钧一般将大小运河译成大小河渠,这是传统名称,但有时也译作运河,如瓜州一章。“人谓城中有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然建于大渠而正对大道之桥拱甚高,……”,《马可波罗行纪》,第578页。河渠,就是运河,大小不一的河渠即大小不一的运河。其中“大渠”,应与大运河等而视之。

是写素描的画家。他的书对中国城市、乡村、学术、工艺品、风俗、信仰、建筑、衣饰、船舶、山川、植物、动物、反抗鞑靼人的战争等,都有精彩的描述。^①这本书由约翰·尼霍夫的哥哥亨利·尼霍夫整理,1665年在荷兰(梅尔斯出版社)和法国分别用荷兰文和法文出版。^{[18]9}根据包乐史的研究,这部书稿经尼霍夫的哥哥亨利·尼霍夫整理并写序,他将许多其余著作的材料添加到各个章节中,并配置了多达150幅的精美插图的生动著作。虽然不是素描,失却了真实性,但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而1658年由尼霍夫亲笔撰写的呈送荷兰东印度公司附有插图的报告,直到1989年才有了中文版,即包乐史、庄国土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译本。^{[18]23}尽管如此,这部书中对皇家运河的看法,应该是西方较早对大运河内涵诠释的实例。

荷兰使团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北上的线路大体一致,走的是当时由溯珠江水路,翻越南岭,经赣州,走赣江,到南昌,由鄱阳湖进入长江,再从南京经仪征进入大运河,经扬州沿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北京,返回也是这条线路。这条线路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南北交通主干道。书中频繁出现运河和“皇家运河”“皇家水道”(Royal Channel, the Royal Water)。有时交替使用,有时为专称。几年后出版的专著,还对皇家运河的内涵作了诠释,基本上符合大运河的特征。

康熙年间来华的米列斯库直接使用了“大运河”名称。“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举世无双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犹如镶嵌在戒指上的稀世宝石。即使积世界财富之总,也无法与中国之富庶相比。”“江河湖泊形成水网,用以连接城市,行船通商。从葡萄牙人的澳门市场扬帆行船2500俄里无阻,只是需在地峡一带换船,费时一天;另外,从浙江乘船可直达四川,横贯整个中国。中国无一城市不是居河而立,或是天然江河,或是人工运河。”^{[15]31}

扬州府,“本省第七大城市扬州府。顺大江而上,可以望见一个大洲,从这里有一条大运河直通这座美丽的城市。所以,这座府城是一个重要口岸,可为皇帝征得可观的税收。不过,这个府城的主要财源还在于制盐,这里的居民用海水熬盐,方法和欧洲相同。居民靠这个行业发了财,建造了大批豪华的房屋。城市挖掘了不少渠道,渠水是可饮用的淡水。”“府城下辖18个小城镇,离城不远挖掘了一条60华里长的运河。运河两岸一律用白色大石块铺砌而成,工艺精美,无可比拟。”^{[15]166}

“中国人历尽艰辛,巧妙筹划,使全国水路网络四通八达,或一改河流故道,或开凿新的运河,全国各地都有水路与北京相通。不仅北方各地,而且南方各地都有水路相通。堪称奇迹的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开挖了和疏浚了几千俄里的水路,所有这些河流渠道都汇集到天津——全帝国最大的港口,全国各地的船只云集于此——然后通到北京。虽然北京土地贫瘠,却样样都有,所以人们说:‘北京不产棉和粮,棉粮堆满仓’。”^{[15]84-85}

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到1840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翻译欧美办的报刊,其英文原文,西方人已经明确称到北京的运河为大运河。1840年4月25日《澳门新闻纸》:“每年解粮到北京之船,有六千九百六十九只,其中有三千零八十四只系由洋子江南边之省份而来,到黄河后,在淮安地方与山东之粮船会同,由运河进京。”^{[13]346}

原文:The palace, or made over to the eight standards. The number of boats employed annually in the transportation amounts to 6,969 vessels. Of these no less than 3,084 come from the

① 约翰·尼霍夫原著,[荷]包乐史、庄国土:《约翰·尼霍夫著〈荷使出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本书包括包乐史著、庄国土译《〈荷使初访中国记〉在欧洲的地位》,庄国土著《早期中荷交通与荷使朝华》,尼霍夫报告《荷使初访中国记》及校注等篇。按:尼霍夫书的名称还有《东印度公司荷使晋謁鞑靼大汗》《荷使朝华记》。

south of the Yangtsze keang, and all but those of Shan-tung, fall near the jun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t Hwae-gan into **the Great Canal**.^{[13]346}

上面英文“the Great Canal”就是大运河,与今天通行的大运河的英文写法“Grand Canal”是一个意思,区别于普通运河 canal,大运河已经是流行的国际称谓。

1842年,“7月从广州寄来的信件提及,根据停泊在江苏扬子江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发来的情报,7月4日他们抵达了位于大运河镇江府上游的扬州。那儿离南京不远,从这个位置看,我们认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与扬子江汇合处已经被英军所控制,南京已是唾手可得。‘京杭大运河这条世界上最长和最重要的人工河道是由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建造的。作为一条交通枢纽干线,该运河从浙江省的杭州一直延伸到了大清帝国的京师北京,全长有700英里。但实际上,那条被中国人称作闸洪河的人工闸坝并没有那么长。它发端于黄河南南边,那儿有条自然的航道将东平湖与清河的出口连接,并从那儿一直延伸到山东省北部的临清。那条航道经汝河(RuHo)和白河抵达北京。’‘我们之所以要这样这样描述大运河,不仅因为它是把商品和漕粮从南方各省运往北京的主要通道,而且还因为假如有人从海上向中国发起进攻时,可以轻易地夺取大运河的某些河段,这样就能切断连接大清帝国华北和华南这两大部分的交通干线。’”^①

17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166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以信函的形式,报道中国见闻。一共14封信。^[19]他已经称运河为大运河。乾隆末年1795年来华的马戛尔尼,途经运河南下,称运河为大运河。^②译者刘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1891年,1934年去世,这个译本是民国五年,1916年所译,其中已经明确译为大运河。此后的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20]其后像李希霍芬、倪维斯、丁韪良、德国人恩司诺等,都称大运河。

那么,为什么大运河不是中国命名而源于西方人的称呼呢?这是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近代以后,西方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他们亲眼看到了长城和大运河,目睹其伟大的体量,巨大的工程,为之惊叹,认为这是世界的奇迹,所以就有了英文中的长城、大运河的称呼。长城是举世无双的,所以称伟大的城墙。中国自称万里长城,足以显示其伟大,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地标。而大运河,虽然也是世界第一体量,但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运河,如威尼斯,所以就将大运河之名,挂在中国的运河和意大利威尼斯运河上。就像西方人称苏州为东方威尼斯,这是比较得来的。还有称克什米尔首府吉尔伯特为东方威尼斯的,这个地方虽然远不能与意大利威尼斯和中国苏州的城市河道相媲美。

在西方人来到中国之前,国人封闭在国内,对外部世界知道很少,很难对世界建筑进行比较,所以,也不太可能将运河比较出一个大运河的称谓,也没有必要。而西方人在进行世界运河的比较之后才有的称呼,就像长城一样。由于长城的独一无二,运河则非中国独有,中国运河只是体量巨大,故韦氏词典中的大运河增加了威尼斯运河,由此可知西方人对长城和大运河的命名非常科学严谨。京杭大运河之前的运河叫通济渠、汴河,姚汉源先生名其为“东西大运河”。京杭运河,清代就有此称呼,而交通部对改扩建的运河以京杭大运河或京杭运河命名。

① 《伦敦新闻画报》第1卷,第27号,1842年11月12日,420页。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北京:北京时代文文书局2014年版,第23页。

② [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史但顿著有《出使 你中国记》。[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2005年。又有安德生著《随使中国记》。[英]乔治·马戛尔尼[英]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本书包括《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巴罗中国行纪》2种;[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青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黄仁宇指出,“实际上,即使在今天每种质量较好的地图上,大运河都被汇为一条连接京师和南方的杭州的船道运河而存在。”他在《明代的漕运》中提供了国外“大运河”的丰富材料。兹摘录部分如下:

甲. 地图方面(摘录部分):

- 1.《商业地图集和市场指南》(纽约,1961年版,页532);
- 2.《世界地图集》(莫斯科,1954年版,页153—154、147—148;
- 3.《格罗塞尔赫德尔地图集》,费赖堡,1958年版,页169、页171)^[21]²

以上地图都是西方世界比较常用的地图集,出版时间多在1958年前后,显然不是因为受到大运河牌香烟的影响所采用的名称。

乙. 工具书方面(摘录部分):

- 1.《百科全书,中国》(伦敦,1917年版)在第216页有大运河条目。
《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纽约,1956年版),称大运河。是隋炀帝在位期间完成的。
- 2.《百科全书,美国》(纽约,1962年版),“中国同样开凿了大批水道,其中包括大运河。它长约1000英里,大约于1289年完成。”

根据我们搜集的世界历史地图资料,17—19世纪国外地图上就将大运河标为“皇家运河(Canal Royal)”“帝国运河(Canal Imperial)”“运粮河(Yun liang Canal)”“大运河(Grand Canal)”等名称,摘录部分如下:

1. 1705年,法国皇家制图师尼古拉斯·德·费(Nicolas de Fer, 1646—1720)的《亚洲东部地图之中华帝国与日本帝国》^①(La Partie Orientale de l'Asie ou se trouvent Le Grand Empire des Tartares Chinois et celui du Japon)将大运河标注为“Canal Royal”。

2. 1801年,英国制图师罗伯特·威尔金森(Robert Wilkinson)《中国地图》^②(China)将大运河标注为“帝国运河(Imperial Canal)”。

3. 1843年,英国实用知识传播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Great Britain))出版的《中国地图》^③(China),将大运河标注为“Yun liang or Great Canal”。

随着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之名也渐为国人所知,中国学者也开始采用大运河名称。1919年,民国水利学家、教育学家胡雨人便使用了大运河一词。^④1926年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在论证南京的都城地位,1927年镇江的省会地位时,都将大运河作为优越交通地位的重要佐证,并给大运河历史作了分期。^⑤显然,民国主流学者已经使用大运河一词。

20世纪30年代,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使用“大运河”之名称。他在谈到水运历史时说:“我们除利用天然河流作运道以外,最大的工程有汴河由开封通泗县。大运河由杭州通天津,灵渠越过海阳山脊通湖南、广西,这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汴河已经是消泯无踪,运河也等于全废。这个原因是因

^① Nicolas de Fer, La Partie Orientale de l'Asie ou se trouvent Le Grand Empire des Tartares Chinois et celui du Japon, Paris, 1705, 大卫·拉姆齐地图中心藏。

^② Robert Wilkinson, China, London, 1801, 大卫·拉姆齐地图中心藏。

^③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Great Britain), China, London, 1843, 大卫·拉姆齐地图中心。

^④ 胡雨人:《无锡江阴合凌太湖长江间大运河刍议》,原载《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7期(1919年),陆阳、胡杰主编:《胡雨人水利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第65—67页。

^⑤ 张其昀:《金陵史势之鸟瞰》(下),《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十五号,民国十五年(1926年)八月;《论江苏之新省会》,《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

为农业国家水运也只限于农产物,农产物常不能走得太远。欧洲每开一道运河,便有许多工厂沿着运河设立。我们的大运河,春秋吴国原不过为开一条路与齐、楚等国交通,后来历隋、唐、元、明,渐渐开辟成一条南北直通的运道,都是为着漕粮,毫无一点工业上的关系。所以漕粮改了海运,运河便只可作区域的农产物交通。此外,东南各省有不少的内河,大多都是人工开的,也只有农运的价值。”^{[22]726}显然,大运河特指吴国开凿的运河,后来演变为京杭大运河。

“黄河自出了河南孟津,南岸尚有广武山挡着,北岸便有堤。若是无堤,黄河的洪水便可以汇合沁河、卫河的洪流一直泛滥到天津。过了荣泽,两岸地势都是平衍,若不是有堤防范,向北可以泛滥河北大平原,向南可以泛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黄河在数十年前,由河南兰封县向东南流经过徐州府、淮安县向东出海。自清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东流由山东利津入海。在山东境十里铺即大运河以下,南岸多山,所以向南决口的机会少,向北决口的机会多。十里铺以上,两岸决口的机会,可以说是相等。北岸幸而有个金堤,尚可以防范,所以每次黄河北岸决口,在十里铺以上的,泛滥的水便顺着金堤流去,到了陶城埠即十里铺的对岸,仍归黄河。这是黄河下游的大概形势。”^{[22]729}

按:山东境内运河被称为大运河。这篇文章是李仪祉先生当年在广播电台向听众发表的水利知识谈话,多次使用“大运河”名称,可知大运河已经是一个为公众熟悉能够接受的名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治淮取得伟大胜利,大运河治理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章伯钧视察“京杭大运河”,乘“江苏(客)301”轮从邳县(今邳州)出发,经淮阴、高邮、镇江、嘉兴等地,南下杭州,历时28天。^①这在当时是有报道的。

“大运河”名称取代了其他名称,成为西方对中国运河最流行的称谓。近代以后,中国文献仍然继续使用“运河”名称,但至少到了20世纪初,也有称大运河,大运河渐渐为国人采用,后来渐渐增多。申遗前后,为走向世界,也多称中国大运河、中国运河。申遗文本就称中国大运河。今天,古运河也是通称,泛指退出航运的历史运河。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指出“大运河名称源于淮安大运河牌香烟”说是无稽之谈。

五、“大运河”命名体现了中国运河话语体系的国际认同

近代以来,运河名称发生很大变化,诸如京杭运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南北大运河。甚至还有学者称隋唐运河为“东西大运河”。^②就国外文献看,20世纪初日本东亚书院就有《大运河调查报告书》,日本书名使用大运河,说明这已经是个通行的名称。1916年的大运河调查报告中对大运河名称有过界定:“所谓运河,一般定义是运输的水道,从通州、天津到江苏的水道被称为大运河。元、明、清时,运河被用于将南方的大米运往北京,被叫做运粮河或漕运河,简称运河。”^{[23]1256}将北京到江浙的,为漕运而修建的运河称为大运河,将大运河与中国其他运河区分开来,这正是从运河到大运河名称的本质差别。该报告书还有1918年等多个年度的大运河调查报告,报告里交替使用大运河或运河。显然,大运河或运河已经成为京杭运河的专称。尽管在某些河段,也还采用漕河、运粮河等传统名称,但作为运河的统一名称,就是大运河。日本学生在中国大运河沿线调查,使用了大

① 《江苏航运史》(现代部分),第189页;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江苏航运大事记》,第158页。

②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第8页。按:姚汉源划分大运河为“东西大运河”与“南北大运河”两个阶段,隋唐大运河“由长安之东南通江淮、过江到杭州是当时的骨干运河,可称为东西大运河。”元明清则称“南北大运河”。但从传统地理上看,以淮河为界分为南北方,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东西段利用黄河天然运道,沟通北京与杭州的运河,实为南北走向,故称南北大运河者为多。

运河这样一个专指从北京到江苏乃至杭州的名称,说明当时国外甚至包括沿岸的中国人,已经流行大运河的称呼,将其作为一种常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中国学界对运河名称已经有过详细辨析。黄仁宇从1959年起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1964年完成。在该书中,运河的称呼并不统一,而是根据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名称。甚至作者是反对统一使用“大运河”来命名整个运河的。他说:“一系列连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工水道被认为是大运河后,错误看法就常常出现。”理由是“大运河是由几个不同的河道组成的,它们各自流经的地域不同,各自拥有的历史起源也不同,因而并不具备共同的特点。如果把不同的河道视为一条运河,那么就会忽略许多相关而又必要的细节。”^[21]译者在注中就指出名称不一所带来的麻烦,包括黄著本身也不可避免。“作者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了 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 和 Ts'ao Ho。后者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漕河。至于其他,作者虽然有时用词并不严格,甚至随意使用,比如 the canal 和 the canals 不分,the canal 和 the canal system 也不分,但基本思路是:the Grand Canal 指的是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the canal 指的是北京到瓜洲的运河,即 Ts'ao Ho, the canals 指由京杭大运河及其他小运河或分运河组成的运河体系,the canal system 指因漕运而设置起来的体系。因此,我们在翻译时推断作者的意思,分别将 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 译成‘京杭大运河’‘漕河’‘运河’和‘漕运体系’。有时,由于作者对 the canal 和 the canal system 不分,所以 the canal system 有时也译为‘漕河’”。

黄仁宇从微观研究的需要上细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运河,赋予不同的历史名称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外国人观感的大运河就是从江南到京城北京的漕河,长期称大运河,而作为学术话语,统一运河名称也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即使在今天每种质量较好的地图上,大运河都被汇为一条连接京师和南方的杭州的船道运河而存在。”大运河就是京杭间的运河,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一词渐渐也被中国学术界所认可,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自宋元以来,“运河”之名渐成为正史典籍中的常用称呼。大运河名称虽然晚起,但也由来已久,最早应源于明清以来来华的西方人,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作为中华物质文化之集大成者,堪称中国古代瑰宝中的双子星,在世界上也是举世无双的古代建筑遗产,体量远远超过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命名长城和运河:长城英文名 Grand Wall,或 Great Wall(伟大的墙);大运河英文名 Grand Canal(伟大、壮丽的人工水道)。多指京杭大运河。近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采用称“大运河”,同时也继续称运河,也偶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新的含义,即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条运河构成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英文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外国人称为伟大的水道,中文直译“大运河”凸显了中国运河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帝国的国家工程、举世无双的长距离本体河道及庞大网络体系。近代以来“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意思相当,已经成为中外闻名的名称,体现了中外对中国运河学术话语体系的文化认同。

“运河”之名,应该是宋元以来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大运河为代表的人工开凿河道通用名称,明清广泛使用频繁,属于传统的“中国名称”或“中国话语”。“大运河”,或“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英文名

Grand Canal,意为伟大、壮丽的人工水道),则是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到中国的欧美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外交官、学者等留下的传世文献对中国运河的新称谓,属于“外来话语”。

从运河到大运河名称的演进,与外国人考察中国之后,在比较中西方运河和工程特色后得出的新认识。大运河包含三层意思:为漕运而专门修建的国家工程、以大运河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水运体系、京杭运河的体量无与伦比,举世无双。这些,身居中国的人们是没有比较认识的,中国人传统观念认为自己是天下文明中心,四方为蛮夷,很少主动了解世界,所以,像长城、运河与世界建筑无可比性,无所谓伟大渺小。长城称长城,或称万里长城,是以距离命名的,根本没有西方人称的“伟大”城墙的寓意。运河也是如此,以漕运或运输功能命名,谈不上伟大壮丽的意思。

18世纪的国外地图上发现,在Grand Canal之前,还出现过“皇家运河”,“帝国运河”这样的称呼,印证了西方人始终把中国运河与国家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作为国家公共工程的大运河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在《中国总论》(1883年修订版)中指出:“中国另一项重大公共工程是大运河,也称闸河或运河。”实际上,在近代以来外国文献中运河与大运河之名长期并用,以特指京杭大运河的“大运河”作为代表性名称。^{[24]21}

近代脱亚入欧的日本文献也频繁正式使用大运河名称,例如,20世纪初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运河沿岸实习所完成的调查报告,就取名《大运河调查报告》。近年翻译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就收录了1916年至1921年间第10、11、12、13、15次大运河调查报告,可知,大运河名称早就被日本人采用。^[23]书中还收有“大运河厘金”一文,未注年代,但文中引用民国七年(1918)山东省财政厅文件,可知为1920年左右。文中称“大运河由钱塘江、扬子江以及黄河分成四段”^{[23]1597}

在近代,总体介绍运河全线情况时,用大运河名称,具体分段时,用运河名称,由于讲总体的少,分段介绍的多,所以运河的使用率高于大运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大运河的名称逐渐流行。1961年绍华(朱偰)的通俗读物《大运河的变迁》应该是较早以大运河为书名的著作,标志着大运河一名为学术界接受。之前他有一本更加流行的学术资料汇编《运河文献史料选辑》。^①之后陆续出现以大运河为书名的著作,^②但与运河之名相比,大运河名称使用的仍然不多。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大运河启动申遗以后,“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使用频率急剧上升,成为中外广泛采用的名称。2006年京杭大运河成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大运河,在2013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提交的世界遗产申遗文本中,写明的遗产名称:“中国大运河”。实际上,2001年由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已经采用“中国大运河”之名。^③

今天,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之名,已经被中外接受,成为洋为中用上升为中国话语典型之一。就

① 绍华:《大运河的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作者另有《运河文献资料选辑》一书。

② 常征,于德源:《北京漕运和大运河史》(待改稿),北京: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1983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陕西师大地理系:《中国的大运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取名大运河的著作增多,如岳国芳:《中国大运河》,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陈璧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 陈璧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主编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大运河的开凿,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水的伟大创举。它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必然,既体现了封建王朝中具有战略眼光和气魄的帝王意志,更是历代水利专家们的科技成就和千百万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大运河的出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它是我国古代一项雄视百代、光耀千秋的伟大工程。”伟大创举、时代产物、战略眼光、帝王意志、科技成就、人民血汗、促进进步、造就繁荣、光耀千秋、伟大工程。

像“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提出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当今已经为中国和世界广泛接受,成为中国和世界话语体系中经典热门的学术专题。^[25]可见,中国话语或西方话语有时也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西方话语只要符合中国国情,更加易于为国内接受,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国际话语。

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名称的出现,是近代外国人首先提出的,是文明互鉴的产物,这就像长城的英文伟大的城墙一样。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而米列斯库对长城大加赞扬,他说:“关于环绕中华帝国的长城,已有无数古今历史学家竭诚讴歌。”“中国人把长城叫作‘万里长城’,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长城实长约1500多俄里,中国人所以称之为‘万里长城’,是喻其巍峨宏大。”^{[15]68-69}

无论是长城还是大运河,英文名都是比较的结果,而中国人的理念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之外,在近代以前,基本上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也就没有比较。而近代以后,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登上了长城、经过了大运河,在他们看来,这当时是世界第一,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人走向世界,了解到域外文明之后,他们自然而然接受西方意境下伟大的城墙、伟大的运河的名称来称呼长城、运河,这才应该是长城、大运河中英译文的由来。

从运河到大运河中西名称的演变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应当指出,西方人在亲历中国运河,由此对中国运河与世界运河的比较中得来的。“中国另一项重大公共工程是大运河,也称闸河或运河。策划和实施这个工程的君王应赢得的荣誉,远远高于中国征服者所建的长城;如果考虑到挖掘的年代和策划者的品格,任何国家的历史上为数不多值得提及的工程,都不会比它更有意义、更有功用。在黄河引水失败之前,运河把几条河流联接起来,完成了从北京到广州、跨越全国的整个水路交通网;它穿过两大河流,将货物和旅客运送到流域的每个大城镇。按忽必烈的规划,运河从京城到达宋代都城杭州,马可波罗描述得再好不过了:‘你必须理解,皇帝要水上交通从这个城市(瓜州)直达汴八里,挖通河流与河流、湖泊与湖泊,成为一条大河,其宽度和深度必须让大船能够行驶。’北端是一条14英里长的运河,从通州到北京,穿过城墙,到宫墙外边靠近英国公使馆的地方结束了近600英里的全程;这一段称为‘御河’,即皇帝的河,但目前所有的船都在东门卸货。”^{[24]21}卫三畏引述了马可·波罗、德庇时等对大运河的描述。“伟大的河”的赞美正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运河全长约650英里,比美国伊利运河长不及两倍,但是,和欧美的重要运河相比,其宽度和深度显得不那么划一。”^{[24]24}“作为一项工程,和西方现有的运河比较,这条运河排列的位次不高;但直至今日。亚洲没有一项同类工程能和它相比;当它全部投入使用时,世界上也没有可以相匹敌的工程。”^{[24]24}按:这一观点,并非全是他本人,出自于许多西方人,在注中他列举了克拉勃罗德《回忆》,小德金《北京之旅》,德庇时《历史笔记》等。在西方科技发达的近代,将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代运河与欧美近代以后开凿的运河相比,古代中国的土木工程技术自然无法与欧美运河相比,但在体量上,无疑世界第一。古代世界各国运河与大运河相比,更是望尘莫及。

大运河名称的使用和被广泛接受,既是对大运河价值地位的充分肯定,也对于运河文化的世界交流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这正与“丝绸之路”这个国际命名一样,早期欧美人在什么地方都是趾高气扬的“西方中心观”者,他们曾经对中国文化有一个长期的考察认识过程,在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叙事过程中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充分认同甚至赞美,也会入乡随俗,投其所好,就像来华的外国人在自己的洋名字之外多取一个音近义嘉雅俗共赏的中文名字一样。海外中国学(汉学)话语体系也充分考虑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所以才有“丝绸之路”“茶叶帝国”“瓷器之路”“大运河”这样带有浓厚“中国中心观”的命名,由此彰

显了世界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相互尊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文精神。我们在努力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①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这种精神,而不是刻意淡化甚至贬低,非得将近代以来国际形成的西方科学话语体系,改造成所谓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种生搬硬拉的中国话语体系很难为国际学术界接受,不可能成为国际话语体系。而这样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兼容了中西文化,体现了中外文化的认同,殊途同归,历久弥新,生命力旺盛。

综上所述,今天,运河是所有人工运河的泛称,中国的运河也是这个含义。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西方来华的旅行家们最早称呼大运河,特指元代以后形成的京杭间的运河,即京杭大运河。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京杭大运河列入申遗预备名单,而将大运河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包括陕西省在内。之后,将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纳入申遗之列,并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形成了中国大运河概念,申遗成功后,中国大运河包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名分,而其余部分。大运河名称的出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产物,表达了国际对这一世界体量最大的运河的敬畏之心。马可·波罗已经称之为大河,伟大的河。明清以来,利玛窦、李明等西方旅行家和学者普遍称运河为大运河,两种名称交替使用。日本也使用了大运河名称。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初已经接受并使用大运河之名。大运河名称较之运河名称,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运河历史悠久,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国家工程,统一帝国水道,联系着一个广大的水运网络和灌溉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顾跃挺、潘虹、汤建玮等老师帮助查找、翻译部分资料,特此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田余庆,李孝聪.唐宋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16—136.
- [2] 范成泰.京杭大运河的名称来源于淮安.淮海晚报[N].2008—09—21.
- [3] 王耀.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6.
- [4] 郑慧生.“运河”正名[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 [5]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 [6] 吴欣.大运河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N].光明日报,2018—02—5(14).
- [7] 范成大.吴郡志:卷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5—26.
- [8] 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44.
- [9] 宋濂,等撰.《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 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1] 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阴市志: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709.
- [12] 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8:6,11.
- [13] 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4] 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5] 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中国漫记[M].蒋本良,柳凤运,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① 比如对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探讨,参考王健、王明德、孙煜:《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路璐、丁少康:《大运河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16] 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马可波罗游记[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 [17]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92—193.
- [18] 包乐史,庄国土.约翰·尼霍夫著《荷使出使中国记》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 [19]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M].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 [20]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M].刘海岩,译.刘天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21]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M].张皓,张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22] 李仪祉.我国的水利问题(1936年)[M]//黄河水利委员会选辑.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2.
- [23]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下册[M].李少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24] 卫三畏.中国总论:上册[M].陈俱,译.陈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1.
- [25] 王健.从“丝绸之路”演变到“近代丝绸之路”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Origin of the Grand Canal's Name and the Grand Canal's Discourse System

WANG Jian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0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popular saying goes that the name of the Grand Canal comes from the "Grand Canal" brand cigarettes produced in Huaiyin in 1958. This is groundless. The name of the Grand Canal has a long history. The Grand Canal mostly refers to the Beijing Hangzhou Canal built since the Yuan Dynasty. For hundreds of years, Westerners have describe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and Canal as being "great and magnific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me "Grand Canal" began to be used as well as the "canal", which was also known as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In 2013,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d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in the world heritage application text, giving it a new meaning. The Great Wall is the name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estern discourse emphasizes its defense function, while the translation follows the Chinese, using the traditional name to reflect its linear length. The canal is the general nam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ighlight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canal, national engineering, the huge wat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its unparalleled volume in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the name of "Grand Canal" has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and adopted by Chinese academia and society. Now it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name.

Key words: canal; the grand canal;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name traceabilit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